



迎接新时代，更要坚定文化自信

□袁学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郑重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这是划时代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科学论断。

谁也不会忘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文艺界便将新时期文学艺术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革”十年的文学艺术相区别，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先后召开过新时期十年、新时期二十年的文艺发展研讨活动，中间也穿插着改革开放十年、二十年的文艺发展研讨总结等学术活动。今天，新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稳定时间最长而最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辉煌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判断、新概念，既有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的建设成就的现实依据，更有一幅宏伟壮丽的发展蓝图的召唤与吸引，全党全国人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新的鞭策，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凝聚力。这一新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立足点和发源地，自身具有时代标志意义和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科研价值，成为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再出发的起跑线，也成为学术界理解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使命新热点的出发点，将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立足新高度，开启新征程。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是习近平同志又一次向全党全国特别是我们文学艺术界发出的新号召、新指令。从2012年以来，习近平同志一再号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复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今天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文化自信的坚持与强化仍然显得十分重要。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树立和坚定了文化自信才会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没有文化自信，失去我们的文化根基和特色，就不可能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如何真正地不折不扣地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的今天更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与总结，彻底地清理我们头脑中的不自信。

我认为，首先要站稳中国文化立场，从骨子里热爱、珍惜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曾几何时，“西方中心论”和“全盘西化”思想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界文艺界。由于在不平等不对称的文化撞击中，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便有人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文化都是封建落后的，从而完全否定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到了今天的新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仍然在进行中。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看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许多理念、观点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求同存异，以及独特的中华美学等等，包含着伟大的中国精神，且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必须树立以我为主、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理念，彻底抛开崇洋媚外的错误心态，增强作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同时加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

坚定文化自信，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既体现了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重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美德，体现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和路径，也昭示着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弘扬真善美的基本要求和应有遵循。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和言论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能违背或挑战之，也要达到做人和作文的一致，成为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和个人文德艺德的持守者。不能说与做两张皮，说与写两码事。我们必须

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素养和学养，克服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的不良风习。要在长期的言行实践中达到德艺双馨，人际和谐，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由此才能形成整个文艺队伍的合力而减少不必要的内耗。

坚定文化自信，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坚定地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在一些人的眼里是一条不太情愿的畏途，其实任何创作都不应当寻找什么捷径，更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将面向自我背离大众视作成功的坦途。习近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因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价值所在”，古今中外文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它们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反映了人民的喜怒哀乐，传达了人民的心声和意愿，为人民所喜闻乐见。试想，一部没有读者的书、一场没有观众的戏，实在是才情的浪费，是对时间、生命和金钱的挥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更不能关起门来孤芳自赏，也不能轻佻地娱乐化市场化，不能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惟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是遵循文艺创作规律的实践正道。新时代的文艺创新过程，作者都必须经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磨砺，其作品才能产生巨大的感人力。当代现实主义精品中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前人的创作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亲历的生活体验和社会调研才能达到对生活对人物理解和表现的深度、精准度。在今天的新时代的创作竞争打拼中，具有文化自信与自觉的作家艺术家，必须无条件地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走向社区，去做人民的小学生，以获得新的素材和灵感。

坚定文化自信，就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美学传统，这是我们树立和涵养核心价值观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中国人文传统、美学传统源远流长。上溯到《书经》《周易》《诗经》等古老典籍中就有其源头。其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人为本、整体主义，是理想远大且自强不息，思维辩证又崇尚中和。其中既有先民们的宇宙观、生命观，又有人生观、道德观和美学观、艺术观，既有大胆的浪漫想象又有本于当时世事的现实性精神。西方文艺理论的美学最主要的基于叙事性小说、戏剧的典型论，而中国古典美学主要是诗文评，形象论与意境说阐发很充分，形神兼备、心物感应、质文兼具等也论之完备。这些在当代诗论散文论中仍在广泛运用，但普遍未上升到中华美学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阐述，大多院校美学课程中也未将其作为重点授之。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提倡中华美学精神引起了广泛重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就必须有对中华美学的自信与自觉，这是新时代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发展的广阔空间。诗文自不必说，即使小说、戏剧、影视也是有其矛盾起承转合、高潮低谷的节奏，有其叙事的风格与韵味的。祖国传统美学理论应当广泛发凡试用，中华美学精神应当全面深入弘扬、发展。我们要发扬中华文化、中华美学自有的包容吸纳传统，开放性地积极主动地进行中西合璧的当代美学理论创新，实现中华古典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总之，我们热烈欢迎新时代，拥抱新时代，就要理解新时代，共同打造好这个新时代，决不能虚度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满怀文化自信，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用实际行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进行文化创新、艺术创新。

最近10年来，搜集整理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的工作虽提上议事日程，但总感觉滞后于其他工作。我能看到的有孔范今、雷达和吴义勤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作家研究资料有莫言、贾平凹等9种；杨扬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丛书，共8种。这两套书各有贡献，但转来转去的还是那么几个作家。1979年至今，中国“当代作家”少说也有几百位，最重要的不会少于二三十位，总是在七八个人之间转来转去，不免有简单重复之感，也不算是真正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丛书”。这里面可能有出版资金困难的问题，也有编选工作分摊过广，效率提不高的原因。岂知197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史“后四十年”，早已是优秀作家群星灿烂，堪称世界一流和亚洲一流的作家应不是一个几个，而是整整的“黄金一代”，关于他们的研究资料反而显得捉襟见肘，我认为真可以用遗憾来形容了。

这种情况下，由学者丁帆、王彬彬、王尧和朱晓进诸教授领衔加盟，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16种《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就不免令人兴奋和大受鼓舞了。在16种研究资料中，恐怕不少作家都是第一次列入，明显填补了文学史空白。人们印象中，新时期江苏出了很多优秀小说家，但到底有多少位谁都说不清楚，这套丛书可以说弥补了这一遗憾。正如丁帆教授在丛书“总序”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将江苏作家作品归入阴柔的江南士子和仕女风格，显然这是一种误读。殊不知，江苏的地理位置以淮河为界，正好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所以阳刚与阴柔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交汇于此。也由于上述的历史缘由，所谓‘吴韵汉风’则是最好的艺术风格注释。苏南的阴柔缠绵、苏北的阳刚恢弘交织在这一方土地上，在泾渭分明之中凸显出江苏文学的多元、大气和包容。”仅这些评价，不解解释为什么江苏当代作家数量众多的原因，而且也指出了他们创作风格的多元大气等特点。我在文学史研究中参考作家研究资料，总喜欢先看其家世身世，再看评论文章，对创作年表和作品发表目录也很留意，看编得是否丰厚详细，有无遗漏的地方。我就注意到一位很重要的小说家的“作品发表目录”，连经常被别人提起的文章居然都没有收入。没有了这篇文章，直觉是一个遗憾。这就使我在引用该文时，既找不到原文（只能跑到他们的散文随笔集上求得），更遑论找到文章发表的确切出处了。有一次为写文章，放下手头工作，先到百度上查，然后四处搜寻，均不得。实在无法，只能让博士生到图书馆漫无边际地去查这些年的文学期刊了。这样一来，就等于大海捞针，其辛苦可见一斑。仅举一例就知道，做作家研究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研究者用得是否方便，是否做到尽量全面详细等环节。王彬彬教授编的《高晓声研究资料》，令我发生浓厚兴趣的是“高晓声简介”这一部分，杨显祖、陈椿年、章品镇、陆文夫和叶兆言等先生写的回忆这位作家的文章，我都喜欢。作家本人的很多生活细节，不是评论文章所能给予的，作家生活中感性的一面，往往也都记载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回忆叙述中。

由这套《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我想到了资料编选中的几个问题：

一是可以适当增加介绍作家家世身世的内容。

当代作家的家世身世，是研究资料中的基础材料，虽然不如作家创作自述和评论文章那么论点突出，但仍然至为重要。比如上面谈到的高晓声先生，人们知道他在南京“探求社”时期的故事，但不十分清楚他被打成右派后回乡的处境。比如他后来在当地做了教师，然而婚姻、收入、家庭成员等问题都不清楚。因为十七年到“文革”时期，江苏苏南武进一带的农村政策、农民收入、生产队工分分配以及当地医疗等问题，给这位作家造成的生活困境，都会影响到高晓声对农村的态度。这是他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起源性问题。没有这段经历，何谈1979年他登上文坛后对农村农民命运的深刻批判和反思？没有这些基础材料，纯粹从作家创作的层面也是说不清楚的，即便文学批评文章，也只看到全国农村的共性的问题，看不到武进县当地的个别性问题。要知道，作家都是具体的人，都是从当地具体生活感受出发来思考和创作的。进一步说，在编辑这些史料的时候，不能只把作家蒙难后的人生故事等材料整理出来，还应该再往前延伸一点，把他的“前史”也稍微加以介绍，例如家族、血缘三代的情况，当地民俗和沿革历史也有点则更好。如果把这个基础材料整理出来，作家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因此，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作家的家世身世史，一定程度决定了他创作史的发生和走向等诸多问题。前些年，我写过一篇《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可能与这部分内容也有关系。这就是编选者在处理“右派作家”研究资料过程中的距离感的问题。我这样写道：“作为‘当代史’的‘当事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把这个‘感情视角’剔除出去，如果这样，那么克罗齐所说的‘历史的人性’、‘历史的积极性质’还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即使考证者不抱着把历史真相告

整理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的重要性

——由《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谈起

□程光炜



诉下一代读者的想法，但如果他的叙述只是一些冷血材料，是一些类似木乃伊的历史断片，那么‘最终的考证价值’又在哪里？说老实话，对这些深奥纠缠的问题”。我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和见解，但这并不表明，它不深层次地存在于我们的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之中。

二是评论文章的删选问题。

当代作家资料研究丛书，我认为第二位重要的是评论文章的选择问题。本地批评家编选本地作家资料，好处是比较了解当时的很多情形，也能够掌握作家创作的整个格局。这套丛书在这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特色。但本地批评家编本地作家研究资料也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复杂的人事关系，家属对编选的影响，中国人一向秉持的“为贤者讳”等心理，也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有些分寸并不是编选者自己能够从容把握的。还有就是，江苏当代作家如高晓声、陆文夫、张弦当时都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初期最活跃的一批作家，他们的作品在获得认可的同时，也会有不同看法，比如一些不是简单称赞而是相对深入的看法，也都会在文学批评中反映出来。有些尖锐深入的批评，反映了当时文学的氛围和状态，有的则是批评家站在很高的立足点上加以俯瞰的结果。尽管有些尖锐的看法不一定都对，或许还有偏颇之嫌，但携带着当时的历史气息、文学氛围，是最真实的时代脉动的反映。我看到，有些印象很深的文章并没有选入，本来可以更有声有色的编选资料，可能稍微平淡了一点。这可能是考虑历史积淀的问题，但选入尖锐文学批评，也不一定妨碍这种积淀，反而是更深厚的积淀。我对此态度是，当时有代表性的甚至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宁可多选点，关系性的以及后来的研究文章宁可少选点或不选。这也许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三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创作年表”和“作品发表目录”的问题。

前面说得比较笼统，这里我想再细化和具体一点。先说“创作年表”。在我看来，年表可看作一个作家生活的“小史”，并不只是他创作的“小史”。因此，除主要作品发表的杂志、时间之外，还应有一定的文学活动和评论的情况附在其中。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洪子诚老师《中国当代文学史》后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听说在写这本教材之前，他把《文艺报》翻过两遍，看得非常细，可能有些还做了笔记之类。所以，你看“1949年”这一节，既有第一次文代会、《人民文学》创刊、“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等等较大的文学事件，也贯穿了一些作家生活的细节，比如，《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议》，9月5日《文艺报》关于《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的座谈会报道。这些大的文学活动和作家个人小的文学活动，交错穿插于历史这个瞬间，形成了多声部效果。虽说是当代文学的年表，介绍的文字不多，但并不显得单薄，主要是编选者的眼光比较细，想问题也细，才会有这种效果。因此，我理解的“创作年表”不只是堆砌作品，还有利用材料更细致深入的观察，没有作家的文学活动，这些创作的作品仍然是冷冰冰的。另外，“作品发表目录”的编选也是如此。大凡作家发表的作品最好是一网打尽，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访谈、自述、散文随笔等等。但这样一来，会不会篇幅太大了点？我的看法是，宁可压缩评论文章的篇幅，也不能削减作品发表目录的篇幅。评论文章如果篇幅不够，我们还可以到杂志上找，但假如目录不详细全面，我们再到杂志上大海捞针似的去一篇篇整理，麻烦就大了。所以，在全书结构上，“年表”和“目录”部分不妨可以适当增容，篇幅占页数多一点没关系。有的编选者可能担心，如果不加筛选地全部搜集，会不会出现过于烦琐庞杂的问题，其实不会。我在《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这篇文章中也谈道：“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一个史料文献整理和叙述的‘简与繁’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妨先‘繁复’一些，力求翔实穷尽，进一步挑拣、筛选和剔除的工作，也留待下一代研究者去做。就是先抢救材料，多多益善，堆积在那里没关系，等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做成一个当代文学史史料文献的巨大仓库之后，后面人的工作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了。”为什么不就简去繁、而要就繁去简呢？这是因为我们距离所整理的作家研究资料距离太近，很多东西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判断、选择和视角，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也是当代人回避不了的。即使是做现代文学的人，也还有此类问题。尤其是“作品发表目录”，关乎到我们全面详细地了解把握一位当代作家作品发表的历史情况，所以这不叫烦琐，而应该称之为详尽，是材料的全面占有。

广告

《扬子江》评论

2017年
第六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王安忆
王安忆访谈 苏伟贞 王安忆
《匿名》之后的现实主义——论王安忆小说新作集《红豆生南国》 张屏瑾

课堂内外的王安忆 张怡微

前沿评论·毕飞宇《小说课》
毕飞宇《小说课》评析 王彬彬
文学的千分之一——毕飞宇的《小说课》 张定浩

文学史新视野(主持人:王彬彬)
在“华语语系文学”中穿行的堂吉珂德——评王德威主编《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 施龙
寻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广阔视域——评姚新勇《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欧阳可瑾

思潮与现象
文体自觉:史识美学范型的演绎与重建 吴周文 张王飞

新诗研究
向可能的生活致敬——读车前子诗集《新骑手与马》 路东

作家作品论
诗文俱佳的才子 有情有义的文人——忆念师友忆明珠先生 徐兆淮
好人的故事: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伦理问题——以《芳华》《好人宋没用》《心灵史》为例 岳雯
“精神写作”与现实主义——关于北村及其转型后的小说创作 徐勇

主编:韩松林,执行主编:丁帆,国内邮发代号为28—271,定价9.00元。欢迎邮购,免收邮资。联系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部。邮政编码:210019。联系电话:025—86486055,电子邮箱:yjzpl@vip.sina.com。

文学港

2017年
第12期目录
总第229期

淡积云(组诗) 宁明
译诗:普拉特利斯特诗选 董雄平译

散文
在场
蝎子 指尖
初夏时节又逢君 沈伟恒
花言草语(四题) 罗芹仙
野花 张顺祥
雁荡风骨 张凌瑞

甬城笔记专栏
大里黄公的户籍问题(中篇续) 柯平

评论
名家刊评 一曲青春与浪漫的挽歌 郑翔
甬上作家 永生的女人 山尹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我承认我有病(小说)(外一题) 卓娅
流离的故乡(散文) 陈如吉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wxgzixu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诗歌月刊

2017年
第12期要目

头条
韩东 赵东 曹有云

隧道
罗亮 西边

先锋时刻
燕窝肖寒 武靖东

新青年
空白安然 李世成 诺布朗杰
阿加伍呷

国际诗坛
文森特·米莱诗选
..... 【美国】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
何谦译

现代诗经
柏铭久 石英杰 舒寒冰 白小云 夏雨
丘晓兰 麦阔 王琪 许泽夫

评论
李海鹏 苏晗 马小贵

小长诗
骑士(节选) 爱松

主编:李云。副主编(主持):何冰凌。邮发代号:26—176。单价:10.00元,免邮资。邮购地址:230001,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6楼612诗歌月刊收。联系电话:0551—62888379。

文艺报

邮购启事

2016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欢迎大家踊跃邮购。定价:300.00元/全年,含上半年、下半年共两册,不单卖,不另收邮资。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本报零售价:每份1.00元。北京地区挂号费5.00元(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费10.00元(10份以内)。或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递。

汇款时请注明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收款地址: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十号六层
邮政编码:100125
收款人:文艺报社收
联系电话:010—65046620